



##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基本特点探析

刘 健

〔摘要〕 卢维语象形文字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古代居民使用的众多语言文字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它是唯一一种用两种文字体系表达的语言：一种是楔形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卢维语楔形文字铭文主要记录在泥板上，内容主要涉及宗教仪式活动。相比之下，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范围、区域、文献类型和内容则更加广泛。本文主要讨论象形文字卢维语文献的分布特征，包括材质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指出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材料具有广泛性。在时间跨度上，象形文字卢维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赫梯时期，既是对赫梯语文献的延续，也是对赫梯文化、赫梯观念的延续。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空间分布特征最为鲜明，不仅远远超越了赫梯语楔形文字文献的地理分布范围，在位置分布上也极大地丰富了赫梯文献的覆盖范围，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赫梯人的王权标志、宗教生活、经济和社会生活。深入研究象形文字卢维语文献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赫梯国家，特别是新赫梯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生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时期古代西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国际关系和文化发展状况。

〔关键词〕 卢维语象形文字；赫梯学；古代安纳托利亚

〔中图分类号〕 K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8) 04-0142-07

卢维语象形文字是古代安纳托利亚居民曾经使用的一种语言和文字。它用象形文字表达印欧语系的一种古老语言卢维语，十分奇特的是，这种语言也用古代安纳托利亚人常用的楔形文字书写，这种用两种文字系统表达一种语言的现象在古代和现代世界均十分罕见。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15 世纪中叶至前 13 世纪末、公元前 10 至前 8 世纪末的两个阶段，跨越了安纳托利亚古代国家赫梯王国统治的末期及新赫梯时代。在 400 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语言文字的使用人群、使用范围、使用区域、书写材料、书写内容、书写格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主要讨论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分布特

征，包括材质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进而总结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价值所在。

### 一、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的基本状况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十分悠久。1812 年，瑞士旅行者约翰·布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在叙利亚的哈马发现刻有象形文字符号的石碑<sup>〔1〕</sup>；1871 年，奥斯曼帝国筹建伊斯坦布尔国家博物馆，其中收藏了一组哈马发现的象形文字石碑；1900 年，第一部专门的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集出版。<sup>〔2〕</sup>早期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中，这种语言文字被称作象形文字赫梯语，随着 20 世纪初赫梯国家首都哈图沙（Hattuša）

〔作者简介〕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今名博阿兹卡莱, Boghazkale, 距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约 150 公里) 的确定和考古活动的逐步展开, 赫梯语、赫梯历史、赫梯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 赫梯学创立。在赫梯学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 属于赫梯学研究范畴的卢维语象形文字语法和文献研究进展缓慢, 但是卢维语象形文字的名称被逐渐接受。研究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哈图沙文献大量出土, 学界的研究大多重点集中于此; 加之在哈图沙考古发掘中, 陆续发现了用阿卡德语、帕莱语、楔形文字卢维语、胡里语等众多古代语言书写的文献, 研究力量进一步分散。另一方面, 由于可资借鉴和对比的资料极其稀少, 卢维语象形文字的破译工作陷入困境, 符号释读举步维艰; 由于同样原因, 卢维语语法的研究几无建树, 语法体系无从建立, 词汇的翻译仅限于部分单词, 文献解读不连贯、不完整。1946 年, 卡拉泰佩 (Karatepe) 象形文字与腓尼基文字双语铭文被发现, 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迎来了新的契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研究进度仍然缓慢, 文字符号的释读、语法体系的解释等都没有形成体系。2000 年, 英国伦敦大学学者 J. D. 霍金斯发表《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集成卷一: 铁器时代》一书<sup>[3]</sup>, 该著作系统总结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的主要成果, 收录了几乎所有已经发现的新赫梯时期, 即铁器时代的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美国芝加哥大学赫梯学者 H. A. 霍夫纳 (H. A. Hoffner) 爵士评价这部著作是“贡献给赫梯学、古代近东历史考古和艺术、历史语言学的一部著作, 它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和可靠的基础”。<sup>[4]</sup> 确实, 由于这部集大成著作的发表, 赫梯学研究领域中高水平的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成果大幅增加, 研究内容也从考古发现简报、文献释读、语法现象研究扩展至运用文献复原历史、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等比较深入、广泛的专题研究, 同时出现了多部语法、文献教材<sup>①</sup>, 表明这种语言文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了解、认识, 赫梯学研究

的内涵不断丰富, 赫梯历史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不可否认, 目前的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包括符号释读尚存在众多不确定性、转写形式不统一、语法归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与楔形文字卢维语的关系尚不明确等。这里, 仅尝试从不同角度解释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分布特征及其意义。

## 二、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材质分布特征

目前已经发现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主要刻写在各种石材上, 也有相当一部分写在印章上。另外, 在铅板、贝壳、陶器和金属器上也发现零星铭文或符号。

各类石刻是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最重要的载体。根据近年的统计, 赫梯考古学者已经在近 100 个地点发现了卢维语象形文字石刻文献。这些石刻文献有的刻在岩壁上, 有的刻在建筑物所使用的石材上, 还有大量铭文刻在各种石碑上。安纳托利亚高原盛产各种石材, 石刻文献使用的石材种类也十分多样, 包括石灰石、玄武岩、花岗岩、卵石、斑岩等。

赫梯印章是最早记录卢维语象形文字符号的载体。赫梯印章的发现数量十分惊人, 仅在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上城西南坡尼桑泰佩 (Nişantepe) 就曾经一次性地发现了 3000 余枚印章。<sup>[5]</sup> 印章的材质也是各异, 目前已经发现的有泥印、青铜印、银印等。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印痕证据表明存在某种类型的印章, 但是印章材质并不明确。

铅板上的文献数量很少, 仅在后来亚述国家的宗教中心阿舒尔遗址发现了 6 封用卢维语象形文字写在铅板上的信件<sup>[6]</sup>; 在庫魯魯遗址 (Kululu) 发现了 5 篇卢维语象形文字经济类文献。<sup>[7]</sup> 铅是不易保存的材料, 说明这类文献的使用寿命不会很长, 具有临时使用的特点, 可以推测有大量刻写在铅板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说明, 这种语言文字也用于日常生活, 极有可能是某个阶段、某个区域或者某个国家居

① 例如 Reinhold Plöchl, *Einführung ins Hieroglyphen – Luwische* (Dresden, 2003); H. Craig Melcher (ed.), *The Luwians* (Boston: Brill, 2003); John Marangozis, *A Short Grammar of Hieroglyphic Luwian* (Munich: Lincom Europa, 2003); Annick Payne, *Hieroglyphic Luwian. An Introduction with Original Text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I. 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wian Language, Brill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 (Leiden, 2010); Ferenc Giusfredi, *Sources for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o-Hittite States*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GmbH Heidelberg, 2010); T. R. Bryce, *The World of the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等等。

民使用的日常语言文字。

另外,目前不能排除卢维语象形文字刻写在木板和蜡板上的可能性。赫梯文文献中曾经出现“写在木板上”“木板书吏”的记录,在西南沿海水下考古出土的乌鲁布伦(Ulu Burun)沉船也发现了可能用于刻字的木板。学者推测,极有可能木板表面覆盖蜡板,利用蜡的柔软度刻写文字。<sup>[8]</sup>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材质分布特征表明,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上述材质中不仅包括可以永久保存的材料,比如石材、青铜等金属;也包括一些易腐材料,比如铅板、木板(可能性很大);另外还有一些传统材料,比如陶土。这些材料蕴含着不同含义:石材、金属因其质地坚硬、可以永久保存、不易刻写等特点被赋予了永固不朽、万世流传的美好寓意;易腐材料的使用说明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传统材料与现代材料共同使用预示着这种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应当十分久远。这表明,卢维语象形文字是一种历史悠久、用途广泛的语言文字。

使用材质的多样性也否定了传统赫梯学者对于卢维语的认识。由于卢维语楔形文字文献大多为仪式文献,出现在赫梯文献中的部分卢维语语句也具有宗教和仪式特征,因此有赫梯学者认为卢维语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卢维语一样,都是用于宗教仪式的神秘语言,而不具备实用价值。卢维语象形文字铅皮文献的发现直接推翻了这个观点。

结合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我们应该能够得出更多的结论。

### 三、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时间分布特征

自19世纪末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被发现以来,用这种语言书写的文献数量不断增加,对于文献年代的确定以及时间分布特征的认识也愈加明晰。确定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年代有以下几种主要方式。

首先,也是最为明确的断代方式是文献中记录的人名的年代已经明确。赫梯王室印章铭文最为典型。赫梯印章铭文的内容简单清楚,早期印章铭文仅列人名,后期印章,特别是王室印章铭文陈列王族世系,是确定赫梯王表的重要依据。石刻铭文中,特别是一些赫梯帝国晚期的铭文中

提及穆瓦塔里二世(约公元前1295——前1272年)<sup>①</sup>、哈图西里三世(约公元前1267——前1237年)、图塔利亚四世(约公元前1237——前1209年)等赫梯国王的名字,文献定年也十分清楚,只需要确认所提及国王的具体身份就能够比较准确地定年。

第二,通过文献内容对比确定文献年代。一些铭文中提及的一些人名能够在已经确认了年代的其他铭文及亚述帝国和赫梯帝国文献中发现,这类铭文的年代也能够据此确定。部分石刻铭文中出现的人名可以相互印证,确定人物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其中部分人物又出现在同时期亚述帝国的文献中,特别是提格拉特皮莱赛尔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和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时期的文献中。比如土耳其内夫谢希尔(Nevşehir)省发现的博恰(Bohça)碑文中提到了新赫梯国家塔巴勒的统治者名库尔提(Kurti),铭文写道:

吾(乃)库尔提,英雄阿什维(Ashwis)之子,东方西土皆知吾名。于此地,吾善待塔晖扎(Tarhunza)神,彼赐吾开疆土(之权);于此地,吾善待闰提亚(Runtiyas)神,彼赐吾丰厚猎物。塔晖扎神从未如此待吾父吾祖,然赐吾开疆土(之权)。吾父吾祖如此做(?)时,闰提亚神亦未如此待彼如之吾。于此,于此,吾猎取百只瞪羚(?),因/自此(?)……<sup>[9]</sup>

这位库尔提应为亚述王萨尔贡二世铭文中出现的阿图纳(Atuna)王库尔提。萨尔贡铭文记载他驱逐了什尼赫图(Shinihtu)王吉亚基(Kiakki),将这块土地赐予阿图纳王库尔提。<sup>②</sup>其中吉亚基这个人名又见于阿卡萨赖(Akasaray)碑和托帕达(Topada)碑文,这样相互印证,相关文献的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前8世纪末期。这种定年方式适用于年代较晚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

第三,根据文字书写风格和语法特征的变化确定文献的年代。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文献,学者们已经确认帝国晚期与新赫梯时期的象形文字书写风格有所不同。帝国晚期的符号更加接近于碑刻体,新赫梯晚期的符号则逐渐发展成为易于书写的草体字,书写风格变化很大。符号使用频率也有变化,帝国晚期图塔利亚

① 本文采用的赫梯国王在位时间依据 Trevor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萨尔贡征服塔巴勒一事参见 T. R. Bryce, *The World of the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pp. 278-280。



四世和苏皮路里乌玛二世时期的部分符号仅在这个阶段使用,之后消失;一些符号,比如 zi/a,在帝国文献中为一个符号表达两个音符含义,在后期文献中用两个不同的符号分别表达;另外,帝国时期的符号普遍采用表意符号,名词与动词词尾使用不多。<sup>[10]</sup>此外,语法特征也有变化,新赫梯时期(约公元前 1000 年)的卢维语表现出比较成熟的发展特征,出现了音字符串、名词和动词词尾变化,音符化特征更加明显。这些都可以作为确定文献相对年代的证据。

第四,部分保存状况较差的文献的断代主要依靠石刻上的其他信息,比如形象雕刻的技巧、风格,以及文字的线条和雕刻工艺等。新赫梯时期的石刻大多涉及神祇形象,其中以雷神塔琿扎为主,他的服饰、姿态等有许多相似之处,线条刻画和风格有可能将各地发现的石刻联系起来,能够大致确认石刻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通过与其他能够确定年代的载体进行比较,能够判断出这类铭文的大致年代,进而与同类铭文进行对比,有可能复原部分铭文内容。

根据上述文献断代标准,大致可以将卢维语象形文字使用的年代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赫梯帝国时期(公元前 1400——前 1200 年),第二个阶段是新赫梯时期(公元前 1000——前 700 年)。

帝国时期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印章文献;另一类是石刻文献,主要集中在帝国晚期。印章铭文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古王国时期。古王国末期基祖瓦特那王伊斯普塔赫苏(Ispuhtasu)的印章上出现了两个象形文字符号,这是可以追溯的年代最早的象形文字使用的证据。<sup>①</sup>早期印章用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刻写印章所有者的名字和官职。新王国苏皮路里乌玛一世时期,赫梯国王正式使用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的印章,但是,需要指出,中王国国王阿尔努万达一世的印章中已经发现了象形文字符号,但并未延续。从穆瓦塔里二世之后,国王印章上

开始出现刻画图案。赫梯王室印章铭文中详细记录印章所有者的家族世系,包括所有者本人的名字、妻室、至少两代(最多可达四代)祖先的名字以及王衔。比如赫梯帝国第一位王苏皮路里乌玛的国王印章中陈列了苏皮路里乌玛、图塔利亚、哈图西里、穆尔西里和□□其共五个国王的名字,穆尔西里的国王印章中刻写了穆尔西里、苏皮路里乌玛、哈图西里、图塔利亚的名字以及相应的王后的名字,可惜多数王后的名字残破不可读。但是由于穆尔西里印章中图塔利亚与尼卡尔玛提(Nikalmati)同列,穆尔西里与嘎苏拉微(Gasulau)同列,表明这个印章应属于帝国时期的穆尔西里二世,另外三位国王应分别是穆尔西里二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这类文献是复原赫梯王表、确定赫梯年代学框架最重要的文献依据。<sup>②</sup>

帝国时期的卢维语象形文字石刻文献数量不多。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卢维语象形文字石刻文献在阿勒颇发现,称塔尔米沙如玛(Talmi-Šarruma)铭文,属于赫梯帝国国王穆瓦塔里时期,约公元前 1300 年左右。另外在土耳其中南部 Emirgazi 遗址发现了图塔利亚四世时期的 4 篇祭坛铭文;在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发现了属于苏皮路里乌玛二世时期的尼桑泰佩铭文等。

赫梯帝国灭亡后,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南部、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先后涌现出众多区域性政权。它们往往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统治周围面积大小不等的区域,统治者大多以赫梯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称“哈梯王”。<sup>③</sup>这些国家分布在今奇里乞亚(Cilicia)、卡赫美什(Carchemish)、泰尔阿赫玛尔(Tell Ahmar)、玛拉什(Maraş)、马拉迪亚(Malatya)、科马基尼(Commagene)、阿穆克(Amuq)、阿勒颇(Alppo)、哈马(Hama)、塔巴勒(Tabal)等地,目前发现的多数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集中在这个区域,以石刻文献为主。据统计,第一阶段石刻铭文数量不多,石刻铭文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发现石刻铭文的比例大约为 1:8。<sup>④</sup>新赫梯时期石刻文献

① 该印出土于塔尔苏斯遗址,参见 H. Goldman, "Excavations at Gözlükule, Tarsus, 1935",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9 (1935), pp. 535-536; 铭文解读和研究参见 A. Goetze, "Philological Remarks on the Bilingual Bulla from Tarsu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40 (1936), pp. 210-214。

② 关于赫梯年代学的确立以及印章文献的作用,参见刘健《赫梯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中心,1999 年,45-68 页。

③ 新赫梯时期的历史,可参见 T. R. Bryce, *The World of the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④ 石刻文献数量和区域分布图参见土耳其学者 Tayfun Bilgin 制作的“赫梯纪念石刻”网站(<http://www.hittite-monuments.com>)。

数量大幅上升的原因不详,考虑到石刻文献在赫梯帝国晚期开始出现的因素,加之帝国晚期古代西亚其他文化中石刻艺术的兴盛因素,卢维语象形文字石刻文献增多可能与外来影响有关。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年代分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刻写材质的变化反映出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范围和用途功能在不断扩展。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其空间分布特征中。

#### 四、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空间分布特征

长期以来,赫梯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献分布地域极其有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拥有大量历史信息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中出土于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尽管近年来陆续在塔皮卡(Tapikka,今名玛莎特, Maşat)、沙皮努瓦(Sapinuwa,今名奥尔塔柯伊, Ortaköy)、沙瑞沙(Sarissa,今名库沙克勒, Kuşaklı)、奈瑞克(Nerik<sup>①</sup>,今名奥伊玛阿, Oymağaç)、埃玛尔(Emar,今名泰勒梅斯科内, Tell Meskene)等遗址发现赫梯文泥板文献,但是发现地仍然集中在赫梯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仅埃玛尔例外,它位于今叙利亚南部,应该是赫梯国家曾经统治的疆域的最南端。另外,在阿拉拉(Alalakh)、乌加里特(Ugarit)、阿玛尔纳等地发现了少量赫梯国家与其他国家或附属国的往来书信,可以稍微补充赫梯语文献不足的缺陷。

相比之下,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分布区域则要广泛得多,根据土耳其学者塔伊丰·比尔津(T. Bilgin)在2015年的初步统计,发现赫梯石刻的地点大约有90多个,主要集中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西部、东部、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这些地点不仅曾经是赫梯帝国统治的领土,也是多个新赫梯国家统治的区域。印章文献主要在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发现,另外,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也在亚述王国的宗教中心城市阿舒尔以及巴比伦国家的首都巴比伦发现,应该是帝国征服的战利品。

地理空间的分布特征能够说明众多问题。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地区是赫梯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是王权的中心,所发现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

献不仅有印章文献,也有石刻文献;不仅有帝国晚期文献,也有大量新赫梯时期文献,是发现文献最为集中的区域。西部地区一直是赫梯帝国的西部边界,阿尔扎瓦国家曾经长期占据这个区域,也是卢维人集中的区域,曾经有学者提出阿尔扎瓦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卢维语象形文字的观点,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sup>②</sup>这个区域卢维语象形文字年代分布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仅限于帝国晚期,并没有发现新赫梯时期的文献。东部地区发现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地点大多为新赫梯国家,年代较晚,以石刻文献为主。东南部地区在赫梯王国时期被称为基祖瓦特那,这里的居民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卢维语象形文字,基祖瓦特那语可能就是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一种方言。该区域发现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跨越帝国晚期和新赫梯时期两个文献分布阶段,这与叙利亚北部区域的文献分布特征一致。叙利亚北部地区一直是赫梯国家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它是连接安纳托利亚高原与西亚其他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地区、伊朗高原、地中海东岸)的交通枢纽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赫梯王国的创造者哈图西里一世时期就已经发动数次叙利亚战争;赫梯帝国国王苏皮路里乌玛一世也极力谋求在叙利亚利益最大化,在占领叙利亚北部领土后,任命两名王子分别担任阿勒颇和卡赫美什总督统治该区域。赫梯帝国灭亡后,叙利亚北部地区也出现了数个新赫梯国家,包括阿勒颇、卡赫美什、哈玛等前赫梯重镇。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空间分布特征也体现为文献位置的多样性上。目前发现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分布在居址内、道路旁、河边水边、深山峡谷中、山顶等不同地点。一些文献在王权中心发现,比如哈图沙发现的印章和尼桑泰佩石刻、各地王宫建筑的守门狮铭文等;另外一类位于一些标志性的地点,比如边界,这类石刻大多具有界碑的含义,具有宣示边界的功能;众多石刻文献分布在高山峡谷、溪流河畔、道路两旁,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圣地。石刻材质的永固不朽特征与所立之地的神圣含义结合,表达了明确的政治宣传的含义,表达王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权威性。

① 该遗址为最新发现的有泥板出土的遗址,发掘者们认为此地应是赫梯文献中多次出现的雷神崇拜中心奈瑞克,参见 Charles Burney,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ittites*, p. 222.

② 关于阿尔扎瓦语,20世纪初挪威语言学家 J. A. Knudtzon 曾经提出“阿尔扎瓦语”的说法,他指出这种语言应当属于印欧语系,事实上,他所说的“阿尔扎瓦语”是后来确认的赫梯语。1919年,瑞士语言学家 Emil Forrer 提出了卢维语的命名。参见 T. R.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pp. 387-388.

一些石刻发现的地点明显是采石场、雕刻场等制造场所。这类碑刻大多是未完成的石刻产品,从其上的刻画浮雕以及铭文的刻写程度可以做此判断。根据周边环境及所发现的各类证据可以做出如下判断:1. 石材来自当地,使用者也大多来自周边区域;2. 根据所发现的采石场、雕刻场数量和所发现的未完成石刻数量判断,石材和雕刻需求量相当大;3. 石刻种类比较统一,多数是守门狮,还有一部分是动物头饰祭坛,也有一些纪念碑材料。

当然,并非所有发现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地点都是原址所在。考古学者曾经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墓葬中发现定年为公元前14世纪左右的青铜印章,应为祖传物;阿舒尔和巴比伦发现的文献应该是战利品,来自阿勒颇等地。另外,有相当数量的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石碑在后世建筑中发现,其中包括清真寺、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也包括民居、堤坝、墓葬等民用建筑。这些石碑大多被重新利用,有些也被后世修改,还有一些显然是因为雨水冲刷或岩壁崩塌等自然因素造成地点改变。当然,各地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些无法确认位置的文献也制造了众多的难题。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空间分布具有覆盖范围广、区域差异明显、位置特征鲜明的特点。在地理区域上,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分布范围已经大大超越楔形文字赫梯语文献的范围,不仅在楔形文字赫梯语文献集中的国家核心区域,在赫梯王国的西部边陲、东部界限都有发现。这些区域中不仅包含帝国时期的权力中心区域和边境地区,也包含赫梯帝国灭亡后出现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众多新赫梯国家所在区域。另外,高原西部区域又是赫梯国家与阿尔扎瓦国家以及阿黑亚瓦国家对峙与交往的区域,也是西亚与爱琴海地区,进而与希腊半岛交往的区域,深入地研究这些地方发现的文献内容,继续开展考古发掘和探查活动将有可能发现相关证据。在

上述发现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区域,材质分布和年代分布差异十分明显,西部地区没有发现新赫梯时期文献,东部地区没有发现赫梯帝国时期的文献,这与文献证据显示的不同时期的统治区域相吻合,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同时发现两个阶段的文献也进一步证明这个区域自古就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鲜明的位置特征表现出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广泛分布性,既有王权中心、国家边境、宗教圣地,也有众多干扰因素,使得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

根据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材质、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得出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具有材质种类多、时间跨度大、区域分布范围广的简单结论。目前所知的楔形文字赫梯语大多刻写在泥板上,也使用青铜、白银等金属板。另外,证据显示,木板,可能还有蜡板也用于书写楔形文字赫梯语。单从材料种类看,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使用的材料与楔形文字赫梯语并无多大区别,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大量刻写在石材上,坚固材料所蕴含的意义更加突出,另外坚固材料、易腐材料以及传统材料共同使用表现出卢维语象形文字使用的广泛性。在时间跨度上,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赫梯时期,既是对赫梯语文献的延续,也是对赫梯文化、赫梯观念的延续。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分布最为鲜明的特征应该体现在空间分布上,它不仅远远超越了赫梯语文献的地理分布范围,在位置分布上也极大地丰富了赫梯文献的覆盖范围,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赫梯人的王权标志、宗教生活、经济和社会生活。<sup>①</sup> 深入研究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赫梯国家,特别是新赫梯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生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时期古代西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国际关系和文化发展状况。

#### 〔参考文献〕

- [1] Annick Payne. *Iron Age Hieroglyphic Luwian Inscriptions* [M].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2: 1.
- [2] L. Messerschmidt. *Corpus Inscriptionum Hettitarum* [M]. Mitteilungen der vordasiatischen Gesellschaft, 5 Jahrgang. Berlin: Peiser, 1900.
- [3] *Corpus of Hieroglyphic Luwian Inscriptions, vol. I: Inscriptions of the Iron Age*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0.
- [4] Harry A. Hoffner Jr. Review: *Corpus of Hieroglyphic Luwian Inscriptions, volume I: Inscriptions of the Iron Age. Parts 1, 2, and 3.* By John David Hawkins.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0 [J].

① 这些特点也体现在象形文字卢维语文献的内容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进行深入阐述。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003, 62 (4): 279 – 282.

- [5] Suzanne Herbordt. Hittite Seals and Sealings from the Nişantepe Archive, Boğazköy: A Prosopographical Study [M] //K. AslihanYener, Harry A. Hoffner Jr. ed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Hittit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Papers in Memory of Hans G. Güterbock*.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2: 53.
- [6] Federico Giusfredi. *Sources for a Socio –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o – Hittites States* [M].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GmbH Heidelberg, 2010: 208 – 233.
- [7] J. D. Hawkins. The Kululu Lead Strips, Economic Documents in Hieroglyphic Luwian [J]. *Anatolian Studies*, 1987 (37): 135 – 162; Federico Giusfredi. Sources for a Socio –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o – Hittites States [M] //Federico Giusfredi. *Sources for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o-Hittite States. Texte der Hethiter* 28. Heidelberg, 2010: 187 – 207.
- [8] Theo van den Hout. *The Elements of Hittite* [M]. 3; Trevor Bryce. *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9.
- [9] [10] Annick Payne. *Hieroglyphic Luwian. An Introduction with Original Texts* [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91 – 100, 2.

(责任编辑: 许丽梅)

